

•CHONG QING KANG ZHAN CONG SHU•

重庆国民政府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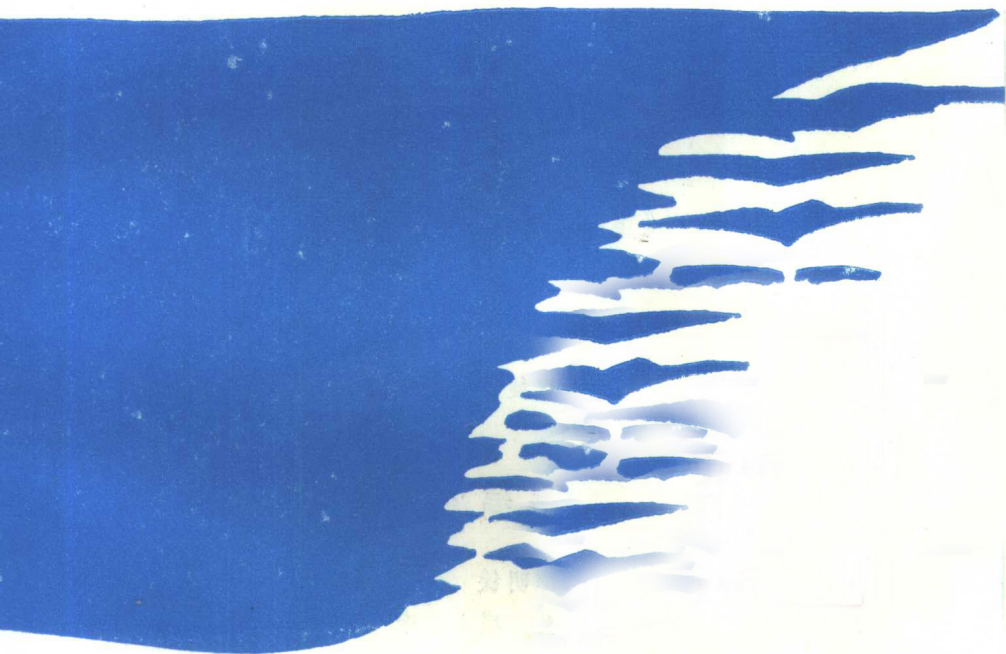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重庆国民政府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杨光彦等主编

重庆国民政府
(重庆抗战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 字数313千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3207-X/K·169

定价: 17.05元

出版说明

一、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振兴重庆服务，特编纂出版《重庆抗战丛书》（下简称《丛书》）。

二、《丛书》属学术性著作。它立足陪都重庆史实，联系全国抗战形势，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层次的研究，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既可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参阅，又面向社会，供广大读者和海外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三、《丛书》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国民参政会、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军事、兵器工业、防空、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对外交往以及陪都人物、陪都遗址和大事记等16本专著。

四、《丛书》的年代断限，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止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某些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史实，可适当将时限前展或后延。

五、《丛书》的开本为大32开，数字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注释一律采用脚注。

六、《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协重庆市委和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中共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日报社、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教学、科研人员与专业干部。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襄盛举的成果。

序

《重庆抗战丛书》，是重庆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一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书。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据我所知，最近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单位也将有一批抗日战争的专著和资料出版。其中《丛书》并且不止一部。在抗日战争过去50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热潮。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由不止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须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历史常有巧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不能自拔。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共42年。那中间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们都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进行了17年，屡起屡仆。日本军国主义却在这个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并进而分裂华北。中国真正临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个严重形势下爆发的。八年抗战的过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过程。在那以后四个春秋，中国人民一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紧接着又跨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关。时代接连不断地迅速改变面貌，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回顾甲午战争以

来10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八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伤巨痛，累累血污，也看到了它的倔强挺立高大的灵魂；不仅看到了旧中国如何死死拖住历史前进的后腿不放，也看到了历史如何促使人们觉醒，加速把旧中国变为一个新中国。

重庆在抗日战争中政治环境独特。它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则是在重庆进行与展开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蒋介石的会面和谈判。抗战期间，重庆本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有研究整理出来，供人了解的价值。谈论抗日战争，少不了要讲重庆的种种活动，就像少不了要讲延安的种种活动一样。历史给予了这两城市极大的光荣。《重庆抗战丛书》一系列研究专题和资料，涉及不少领域，具有特色。人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去认识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怎样为后来新中国的降临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把全国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了。许多地区，不分前线与后方，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史实值得笔之于书。有了它们，就有了我们全民族这场惊天动地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全貌。《重庆抗战丛书》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它是我们看到的以地区命名的第一部大型历史书，不是这方面仅有的一部书。

刘大年

1993年5月4日

绪 论

在编写《重庆国民政府》的过程中，我们曾注意到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重庆国民政府的由来；二是重庆国民政府的特点；三是重庆国民政府史的分期；四是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基本评价。现就这些问题略加说明。

(一)

重庆国民政府是南京国民政府为适应持久抗战之需西迁重庆后的代名词。国民政府是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拟订的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国家治权机关。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是指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附属机关（如文官处、参军处等）；广义的是指行使治权的中央政府全部，包括狭义的国民政府及五院。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建立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是为国民政府的前身。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会便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以委员制代替大元帅制，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后通称为广州革命政府。它是当时革命的最高政权机关。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特议定迁驻武汉。1927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迁往武汉。是为武汉国民政府。同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血腥清共，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称南京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也实施“清共”使武汉国民政府逐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1928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灭亡，南京国民政府一跃而成为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中央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后，其组织也渐趋完备。1928年2月，国民政府以谭延闿为主席，下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和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依照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实施训政”。10月3日，国民党中央颁布了《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又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据此选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古应芬为国民政府文官长、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至此，五院制的国民政府趋于完备。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进行“自卫抗战”。10月，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首都南京濒危，

国民政府断然决定迁都重庆。11月17日，林森主席率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及其他部分机构撤离南京，先行西移。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驻渝办公，重庆国民政府由是开始。

国民政府之所以西迁重庆，是因为：其一，重庆是西南重镇，水陆交通较为方便，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有作战时首都的条件；其二，华北失守，原定的行都洛阳、陪都西安易受日军威胁，武汉、广州更是易攻难守，不宜作战时首都，相比之下，只有重庆为宜；因为它东有天然的长江三峡、北有秦岭、大巴山、南屏云贵高原，西临横断山、青藏高原，退可守进可攻；其三，经过参谋团和重庆行营的近三年努力，重庆已为国民政府牢牢控制。同时，四川物产丰富，“甲于各省”，人口众多“名冠中华”。国民政府迁此则可借其人力、物力和财力“复兴民族”。因此，重庆国民政府乃是国民政府因应持久抗战的产物。

（二）

重庆国民政府虽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的代名词，但与在南京时期相比仍然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重庆国民政府是一个抗战政府（或叫战时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在反共血泊中拼凑起来的，在1927年4月到1937年7月的10年间，其主体是一个内战政府，而不是抗战政府。先是对北洋军阀的“北伐”，继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然后是大规模军事“剿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热河并进而侵扰华北，而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出面抗战。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虽宣布“自卫抗战”，但为时很短便迁往重庆。而重庆国民政府从总体看，却是一个抗战政府。首先它的出现就是抗战的结果；其次，重庆国民政府坚持了8年抗战，并赢得了胜利。其间虽有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和多次出现过动摇妥协倾

向，但抗战毕竟是主流。它的机构设置，法制建设、政策措施，大都是以抗战的面目出现的。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所没有的。其后虽有半年（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的和平发展时期，但也不妨碍重庆国民政府是抗战政府的性质。

第二，重庆国民政府是一个党政军一体化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既要受制于国民党，又要受制于军事委员会，没有形成一体化，国民党内有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又有指挥党政军的权力，这表明南京时期，其党政军还相互牵扯。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不同，它是实行党政军系统权力一体化，集中于战时军事独裁制之下。1939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特设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国民政府五院和军事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均受其指挥，战时总动员委员会也直隶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这样，不仅南京时期的中央政治会议之职权被代行，而且南京时期的军事委员会的权限也受其节制。党政军形成了一体化。

第三，重庆国民政府是一个呈现某种民主化趋势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地道的国民党一党政府。1932年“国难会议”虽决定设立一种“民意机关”，以便把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但因种种原因，南京时期一直未能正式建立这一机构。1938年，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建立国民参政会。它在重庆国民政府中既有建议和咨询的作用，也有部分商量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同时，重庆国民政府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设立省、市、县参议会。这样，重庆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呈现某些开放趋势，一些非国民党籍人士与国民党内非蒋系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加入到国民政府各级政权组织中。周恩来、黄琪翔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实业家卢作孚出任交通部次长，章乃器出任安徽省粮食厅厅长，等等。

第四，重庆国民政府更是一个呈现党政独裁化的政府。由于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执政和以党代政的，故而国民党的党内领导体制对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影响极大。抗战时期，民族矛盾虽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并没有消除，相反，有时还在激化，加之国民党的阶级属性，这就必然制约着它在驱使重庆国民政府一度呈现某种民主化趋势的同时，而又更注重向党政独裁化迈进。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立“总裁制”的决议案，并推蒋介石为总裁。总裁制的设立，使国民党中执会的权力大大减少，它标志着国民党已开始独裁化。蒋介石不仅以总裁身份对国民党实行独裁，同时又以总裁及行政院长身份对国家行政大权实行独裁。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立即以行政院长代行主席职。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全会同时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行之；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正、副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这表明，蒋介石的统治权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三)

重庆国民政府虽只有8年半的时间，但其经历仍可大体划分为6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37年12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开始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军委会余部迁往重庆，历时一年。此为重庆国民政府逐渐完备时期，也即国民政府西迁时期。1937年8月，

淞沪战起，南京濒危，国民政府即始择都之议。10月底，淞沪决战失利，国民政府择定迁都重庆。11月中旬起，林森率第一批机构及工作人员西上，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新址正式挂牌办公。1938年6月，因武汉战事吃紧，原滞留武汉的国民政府各部会又奉令迁渝。12月8日，蒋介石率军委会余部也飞抵重庆。至此，国民政府西迁工作结束，重庆国民政府的组织也趋完备。

第二个时期，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重庆国民政府策略转向时期。其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对华策略，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同时，英美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重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出现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二是蒋介石集团加紧对中共的军事摩擦；三是与日谈判；四是巩固西南力求苟安。

第三个时期，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到1943年11月开罗首脑会议结束，这是重庆国民政府的鼎盛时期。首先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正式对日作战，重庆国民政府摆脱了孤立抗日的局面，并由此与英美苏并列为四强，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其次，因中国军事与太平洋、东南亚战争联为一体，使得重庆国民政府有了参与国际军事等重大问题协商解决的机会，中国军队出战滇缅，蒋介石出访印度、签署四强宣言和开罗首脑会议，都证明这一点。第三，这一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也为适应抗战新形势而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交通、通讯、经济、科技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第四个时期，从1943年12月开罗会议结束开始到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回国布防结束，这是重庆国民政府举措维艰时期。政治上，重庆国民政府日趋独裁化、法西斯化；经济上，由于日军的全面封锁、加之官僚资本的掠夺和一些官吏的贪污成风，国统区经济一片衰落；军事上，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与欧战、太平

件战场以及敌后解放区战场的节节取胜形成强烈反差。由此激起了国统区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1944年，被蒋介石称之为“最黑暗的一年”。

第五个时期，从1945年4月湘西反攻开始到1945年9月南京受降止。此为重庆国民政府争取抗战胜利的时期。1945年4月，国民政府军在湘西实施攻势防御并乘胜反击，后因驻华日军“收缩中国战线”，两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日军渐次向山东、华北、东北撤退，重庆政府军乘此组织了桂柳反攻。直到8月10日，日本乞求投降；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重庆国民政府军事代表何应钦缴械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

第六个时期，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为重庆国民政府结束时期。因本书重在论及重庆国民政府抗战之史实，故对这一时期未曾专章列入，只以尾声形式稍加说明。

(四)

重庆国民政府不仅在时间上占了国民政府22年历史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在作为上也是国民政府值得肯定的时期。对此，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一，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和联共是主流，不可否定。在抗战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因内外因素影响，曾派出过一些重要人物与日谈判，有降日和妥协的迹象，但它毕竟没有降日和公开对日妥协，而始终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并在正面战场，滇缅战场同日军进行大规模会战，歼敌百余万，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既在战略上支援了解放区战场，又同解放区战场一起，在战略上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联共问题上，重庆国民政

府虽曾制造过两次大规模军事磨擦，但毕竟没有引发内战。国共合作局面的维持仍是主体、主流。

其二，重庆国民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其主流也是好的，应予肯定。政治上，重庆国民政府一度对民主有所开放，容纳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在政权设置上基本适应了抗战的特殊形势，在法制建设上，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法律、法规、条例，如国家总动员法、惩治汉奸条例等。经济上，组织和扶植工业西迁，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了抗战，而且对以后西南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力发展交通通讯，打破了西南过去的封闭局面。在科技文化上，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积极鼓励和组织科技文化机构西迁，而且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还给大量的财政资助，致使中国战时科技文化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几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其三，重庆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外交成就，也是值得重视的。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为一个主权基本独立并同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共商国际事务、参予联合国筹建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收回清政府出让的租界、租借地、治外法权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特权，以平等新约形式重新建立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在抗战中，重庆国民政府基本执行了抗战外交政策，既注意同社会主义苏联谋求和平相处，又积极同英美联合，同时还注意了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斗争尽其微薄之力。所有这些，比起南京时期的国民政府，其进步是显著的。

当然，重庆国民政府从本质上说，仍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它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如在抗日和联共问题上，它不可能始终一贯，坚定不移。在一些法令措施的执行上，由于战争特殊环境确实存在一些有令未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到抗战后期，因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垄断资本

日趋猖獗，农业凋敝民族工商业处境危艰。重庆国民政府未能采取有效办法。相反，在政治上日趋专制、腐败，军事上豫湘桂大溃退，国统区人心大变动。这些，不仅暴露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致命弱点，而且为其以后历史的演变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

顾问 黄 冶

主任 张文彬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中文 刘崑水 李书敏 杨光彦 耿 聪

陶维全 徐朝鉴 蒋际华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湘 文履平 刘豫川 冯玉荣 李宗杰

杨从荣 陆大钺 陈贤义 罗传勛 周永林

周宗贤 郭培基 黄长军 彭伯通 蒲华清

《重庆抗战丛书》编辑室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编 辑 陶才祯 、 杨耀健 王建西

本书编写人员

主 编 杨光彦 陈明钦 张国镛

编写人员 陈一容 兰 瑛 李 强